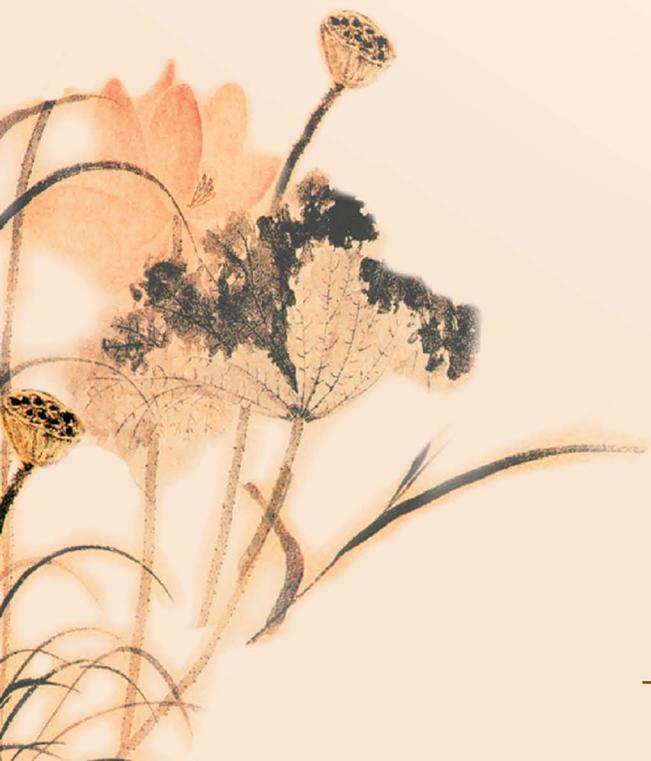




中国隐士的品格

王广新 著



陕西出版集团
三秦出版社



作者传略

王广新，男，汉族。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留山镇人。西安文理学院教授。

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始，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开设教学讲座七次，做了一些文化普及工作；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，四十多万字；主编高校教材《中国古代文学》（全四册，一百余万字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）；参与编著《中国古典戏曲词典》（五百多万字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），为主要撰稿人之一；出版论文集《风雨沉思录》（二十三万字，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）；传记文学《崢

中国隐士的品格

王广新 著

陕西出版集团
三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中国隐士的品格 / 王广新编. - 西安: 三秦出版社, 2010. 12
ISBN 978 - 7 - 80736 - 831 - 1

I. ①中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隐士 - 生平事迹 - 中国
IV. ①K82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80122 号

中国隐士的品格

著 者 王广新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
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
电 话 (029) 87205121
邮政编码 710003
印 刷 长安大学雁塔印刷厂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印 张 6.5
插 页 4
字 数 168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
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 - 1000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80736 - 831 - 1
定 价 28.00 元

网 址 WWW. sqcbs. com

序

中国隐逸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中国隐士是中国农业封建社会孕育而生的特产。早在远古时期、先周时期、先秦时期中国文化发轫之初，隐士人物即亦随着社会的发展应运而生，登台亮相，所以隐士是和中国文化与生俱来的，因此历史久远，源远流长。《周易》上概括隐士行为的准则为：“初九曰：‘潜龙勿用’，何谓也？子曰：‘龙，德而隐者也。不易乎世，不成乎名；遁世无闷，不见是而无闷；乐则行之，忧则违之，确乎其不可拔，潜龙也。’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：初九说：“潜龙勿用”，初九爻辞说：“巨龙潜伏水中，暂勿施展才用。”孔子指出：“这是譬喻有龙一样品德的人，他不被世俗改变节操，不热衷于创立功名；避世隐居没有苦闷，不被世人赞许也不苦闷，对高兴的事就去做，对可忧的事就避开，具有坚定不可改变的意志。潜龙，就是隐居的君子。”上九说：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”这就是说，不去事奉王侯，保持高尚的志向。如巢父、许由、子洲支父、善捲、石户之农、北人无择、卞随、务光、伯夷、叔齐等，他们都是生活俭朴，自律甚严，素养很高，贤名远扬的社会名流。其名声、威望和影响力，都能超过朝廷官员，超过当时的部族领袖，超过部族联盟领袖，甚至超过君王。“虽岩居穴处，而王侯不能与争名。”（《韩诗外

中国隐士的品格\

传》卷五)这是因为,他们不压迫人民,不剥削人民。他们躬耕自食,过着勤俭朴素的生活,不慕虚荣,不事张扬,与世无争,与人无争,宁愿默默无闻。自此,社会上便形成一个共识:识隐士行为为高尚的行为,受人尊敬的行为,受到人们喝彩的行为。这是一个道德与智识兼备的群体。不过,那时名流数量,少之又少,所以物以稀为贵。绝不像时空转换几千年后,社会名流如过江之鲫,一个树叶掉下来,便可砸倒一片名流。

每个时代的隐士,除少数假隐士外,还有一部分是厌世思想的产物。他们把人世间看做是一个苦海,一切众生,沉沦其中,都在苦苦挣扎。苦海是茫茫无边的,世上万物都是水中花,镜中月,瞬息万变,转瞬即灭。最好的解脱办法,就是看破红尘,回头是岸。就是祇求自身的安闲自在,心境快乐,躲入世外桃源去做隐士。无论过去和现在,人们批判隐士,主要是责怪这一部分隐士对国家、对人民,麻木不仁,明哲保身,只重自我,无所贡献这一面,但却忽略了隐士不争权夺利,不尔虞我诈,不败坏社会风气,并对追逐官位的潮流起到一种对抗平衡的作用,这是一个正面作用。还有另一个正面作用,就是每个时代的隐逸人士,实际上就是为国家贮备的“人才库”,以备不时之需。当有事需要时,朝廷就可征召他们,赋予特殊使命为国家所用。例如,姜尚就是被周文王从陕西宝鸡渭水之磻溪,“载以俱归,立为师”(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)而治理国家,从而灭商纣建立周朝的,开创了八百年的基业:“范蠡事越王勾践,既苦身戮力,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,竟灭吴,报会稽之耻”(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);诸葛亮就是被刘备从隆中“三顾茅庐”请出山来,出将入相建立蜀汉政权,形成“三足鼎立”之势;张养浩致仕隐居家乡山东,天历二年(1329),陕西发生大旱,出现“饥民相食”的严重灾难时,元文宗特拜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,前往赈灾,后因积劳成疾,死于任上。

当时朝中众多官员，难道就没有可以担当此重任的人吗？而非要选派一名已经退休而回到山东老家的汉族官员。我们可以理解为，当时元朝朝廷认为张养浩是最合适的人选，肩负此一重任，非他莫属；刘基这位元朝的进士，浙江青田的隐士，后来成为明朝的开国功臣。明太祖常呼“老先生”而不名，曰：“吾子房也”。为明朝建立不朽功勋。等等，此类事例很多，都是隐士出山，为国献功的事迹。这都表明隐士群体中水深莫测，人才辈出，卧虎藏龙。

汉代以前的入仕，被社会公众视为鄙。鄙，看不起。如“肉食者鄙。”（《左传·曹刿论战》）“君子所鄙。”（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）鄙，耻也。这为现代社会很难理解。而对于出世者，即隐士，则被视为“潜龙”，即“有德而隐居的君子。”（《周易·卦一》）上面列出的名流，属于这一类。后来，社会风气发生变化，按照鲁迅先生的看法，“汉唐以来，实际上入仕并不算鄙，隐居也不算高，而且也不算穷，必须欲‘隐’而不得，这才看做士人的末路。”（《且介亭集·二集·隐士》）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风气，把科举和隐遁看做是登上社会政坛的两种不同的途径，即“双轨路”，殊途可以同归。科举是干禄入仕的正途，但三年一举，一举录取的比例太小，名额太少。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的人，只是对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人陪考一次。于是就有一部分人干脆不去应试，或应试失利后，便另辟蹊径，隐居深山幽谷，开始做一个表面上声闻不彰，息影山林的人物。等到名气大了，自然有州郡来推荐他，朝廷来征召他。这同样也是可以成为猎官的捷径。所以，他们遁入山林后，就株守茅庵，翘首以待，静候“蒲轮安车”^①侍从来

^① 蒲轮安车：古代征聘贤士，用蒲草包裹车轮，使其乘坐舒适、安稳、少颠簸，以示待遇优渥。

中国隐士的品格\

接他们下山。有了这种思想所趋、社会所重的背景，隐逸之风便盛行起来。于是许多人都在走这条路。这与远古时代巢父、许由所形成的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”的“箕山之志”，出现思想上的分野。

隐逸猎官之风的兴起，应该认为是从六朝开始，隋唐宋盛行。如魏晋之时的山涛，南朝时的周顒，隋朝的苏威，唐朝的卢藏用、杜淹、裴迪、吴筠等，宋朝的种放等等。《新唐书·卢藏用传》说：“司马承祜（隐士）尝召于阙下，将还山，藏用指终南山曰：‘此山大有嘉处’。承祜徐曰：‘以仆视之，仕途之捷径耳。’藏用惭。”卢藏用隐居终南山时，心中所蓄都是朝中之事，所以人们称他为“随驾隐士”，寓有嘲讽之意。这就是“终南捷径”的含义。这也正是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。南唐有一位诗人叫左偃（《全唐诗》载他诗十首），自述他悲惨的境遇道：“谋身（即“谋官”）谋隐两无成，拙计深惭负耦耕。渐老可堪怀故国，多愁翻觉厌浮生。言诗幸遇明公许，守朴甘遭俗者轻。今日况闻搜草泽，独悲憔悴卧升平。”（《寄韩侍郎》）一语道破了所谓“隐”的秘密，也表露出土人的苦衷和无奈！士人都是先走科举谋官之路，如果不成，再走谋隐一（曲线）谋官之路，如果二者皆无所成，当然是很悲惨的结局了。

历史上，勿论朝野，对待隐士的态度和评价，汉唐以前：崇敬；汉唐以后：宽容。很少出现不能容忍的言论。只是对待少数功利思想太过彰显，假以隐士之名，而进行投机谋利的人，世人才会给以白眼，进行鞭挞和诟病。到了近代，人们对隐士的期望值升高，要求严苛，批判的声浪才高涨起来。其主要原因是：异族入侵，山河破碎，生灵涂炭，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哀号。作为隐士，国家如泰山崩，黄河溢，你们却目无所见，耳无所闻，人民从感情上是无法原谅和接受的。其实清朝的隐士，大多数其隐非隐，成为抗清斗士。特别是顾炎武倡言“天

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口号后，隐士们才更是成为千夫所指而无地自容了。

二

如果从西周初年算起，到清朝末年帝制结束，中国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，共经历 252 位君主。这些君主对待隐士的态度，也有天壤之别的迥异，难以一一评述。这里仅限于君主对待隐士的态度，而不涉及政绩等其它方面，大致可笼统地概括为三个层次：（一）大度、仁慈、宽容、关怀，占君主的一小部分；（二）态度中平，不好不坏，甚至包括漠不关心，不闻不问者，占君主的绝大部分；（三）心胸狭隘，不能容人，甚至进行疯狂迫害者，是君主中的极少数人。

对待隐士能够施以仁慈、宽容、关怀、胸襟豁达大度的世主，比较而言，要数西周文王姬昌、武王姬发、东汉光武帝刘秀、三国蜀汉昭烈帝刘备、唐高宗李治、元世祖忽必烈等几个比较开明的君主。

周文王、周武王父子都不仅能慧眼识才，而且能够知人善任。在姜尚年已七十，从他的自荐中，仅仅知道他在“东海之滨”（今江苏连云港境）隐居过。在朝歌（殷之别都，今河南淇县）做过屠宰户。在棘津（今河南延津县）卖过蒸馍。在磻溪（今陕西宝鸡市东南伐鱼堡）无钩垂钓，就“载以俱归，立为师。”

三年后，西周形成同心协力，群策群力，诸侯无二心的政治局面。司马迁评价说：“天下三分，其二归周，太公之谋计居多。”（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）

周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，又拜年已八十有余的姜尚为诸侯联军统帅，誓师东征，讨伐商纣。古人迷信气象和占卜。临行，暴风雨骤至，群公尽皆失色。卜，龟兆不吉。唯太公力排众议，

中国隐士的品格\

强行劝导武王，挥师东进。牧野（今河南淇县西南）一战，灭纣，开创周朝三百年基业。后来封地于齐，齐又成为大国。

姜尚之所以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，实现自己的抱负，成为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，与二王（史称“二圣”）的知遇是分不开的，与二王提供的施政平台是分不开的。二王两次任命姜尚，委以重任，是冒极大风险的。由此，我们又可看出二王的胸襟、魄力、胆识、知人和雅量，这就是二王的最可贵之处。

当朝廷蒲轮安车征召隐士时，也时常出现隐士坚持“守节不仕”的愿望，大多开明君主也能够理解和宽容对待。汉光武帝即位后，将自己当年的同窗学友严光召至京师，拜谏议大夫。晚上与严光同榻抵足而眠，严光睡相不好，甚至把脚压在光武帝身上。“明日，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。帝笑曰：‘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。’”（《后汉书·严光传》）最终严光还是辞归富春山，过自己的渔樵农耕生活，刘秀表示理解和宽容。在召见周党时，他伏而不谒，自陈“愿守所志”（即继续隐居），博士范升奏毁周党：“敢私窃虚名，夸上求高，皆大不敬。”光武帝能以平和心态对待，并下诏曰：“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，伯夷、叔齐不食周粟，太原周党不受朕禄，亦各有志焉。赐帛四十匹。”放归。（《后汉书·周党传》）

刘备（161—223），字玄德。涿郡涿州（今属河北）人。虽为贵族后裔，但出身卑微。少孤，与母贩履织席为业。不甚乐读书，善交友，尤其好交结豪侠。性格坚毅，待人宽厚。谦恭仁慈，不嗜杀人。喜怒不形于色。生活锤炼了他运用纵横捭阖的公关手腕，应对危难局面的能力。遇事，总能趋利避害，逢凶化吉。对敌人，以巧周旋；对朋友，以诚相待；对部下，以宽相处。

在荆州，他结识了南阳—荆襄—沔南隐士群体，并得到他们的帮助。从此，“荆州豪杰归先主者益多，（刘）表疑其心，

阴御之。”（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）但刘表不久病逝，荆州统治集团陷于立嗣的内乱之中。这个隐士群体，就是南（阳）襄（阳）地区的社会名流和中小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。如庞德公、司马徽、诸葛亮、庞统、徐庶、崔州平、孟公威、石广元、黄承彦等。他能屈尊以求，三顾茅庐，延请诸葛出山，委以军国重任，以致成为蜀汉政权刘备时期的二号人物，刘禅时期（前期）实际上的一号人物。即使刘备临终，仍心神无二，举国托孤，君臣以诚相待，如鱼得水。

这样，诸葛亮、庞统等人遇到这样的明主，受到这样的知遇之恩，他们能不殚精竭虑，鞠躬尽瘁吗？由此可以看出，刘备是个毫无帝王霸气，更多仁慈之心，睿智开明，罕见完美的君主形象。

唐永徽年间，隐士田游岩入太白山，又入箕山，频召不出。高宗幸嵩山，遣使就问其母，赐药物絮帛。并亲至其门，游岩野服出拜，仪止谨朴。拜崇文馆学士。天子亲书榜其门，曰：“隐士田游岩宅”，晋太子洗马。后又宽容其主动归山，“蚕衣耕食”。潘师正隐居嵩山逍遥谷。高宗幸东都，召见，垂问所需，对曰：“茂松清泉，臣所需也，既不乏矣！”此话听来，颇为刺耳。若是换一个皇帝，气氛就不会这么融洽了。高宗尊重他的选择，并在他隐居处建崇唐观，以改善他的隐居条件。潘师正享年九十八岁。（《新唐书·潘师正传》）李治在位三十二年，对待隐士的宽仁程度，由此可见全貌。其后，武则天在其统治的十几年中，虽然也能正确对待隐士，但已远远达不到李治的水平了。

元世祖忽必烈对待汉族隐士，如刘秉忠、姚枢、许衡、窦默、杜瑛等人，从漠北藩府开始到元朝建国以后，都能以诚相待，用人不疑，委以军国重任。许衡与权臣王文统、阿合马政见相左，他曾五次辞官，五次被召回。1270年再三恳辞，帝均

中国隐士的品格\

不允。许衡坚不下殿，左右掖之曰：“有旨令先生出矣！”将出殿门，许衡仍还奏曰：“陛下令臣出，当出省去耶？”上笑曰：“出殿门尔。”（《元史·许衡传》）由此可见君臣融洽的关系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也有一些君主由于出身、经历以及其它原因，未能宽仁地对待隐士，甚至成为极其恶劣的典型。如：汉高祖刘邦、魏晋时期晋王司马昭、明太祖朱元璋等。

刘邦，本是江苏沛县陋巷小痞，文化缺失，素养浅薄，对士人极不尊重，总爱谩骂侮辱人，曾用士人的帽子当溺器等，面对这斑斑劣迹，“四皓”就不能忍受，逃匿商山，发誓“义不为汉臣”。

曹魏后期，大将军司马昭（后为晋公、晋王，死后谥文帝）专权，大搞白色恐怖，致使社会万马齐喑，疯狂迫害“竹林七贤”。当初嵇康家贫，尝与向秀在大柳树下锻铁，与吕安一起灌园。贵公子钟会闻康名而前往造访，乘肥衣轻，宾从如云，而康扬锤不辍，旁若无人，钟会含恨而去。嵇康问他：“何所闻而来，何所见而去？”会对曰：“闻所闻而来，见所见而去。”钟会在晋王司马昭面前诽谤说：“嵇康，卧龙也，不可起。公无忧天下，顾以康为虑耳。”（《晋书·嵇康传》）嵇康因之遇害，“竹林七贤”集团遂告解体。当时天下竟找不出一小块隐逸之地。魏帝（高贵乡公）曹髦说：“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。”（见《汉晋春秋》）

朱元璋同刘邦身世相类，出身草莽，对士人总是口是心非，耿耿于怀，不能以宽容心态对待，甚至还订出“寰中士夫不为君用”的惩罚条款，“其罪至抄劓”。“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，苏州人才姚润、王谟被征不至，皆诛而籍其家。”（《明史·刑法志》）（籍：没收家产）。戴良，朱元璋两次征召，欲加之官，俱以老疾固辞，因而忤旨，明年四月暴卒。疑其被逼自裁也。（《明史·戴良传》）戴良之死，多少有点个人因素。

戴良不忘故主，坚持维护元朝体制，不与新朝合作，因而招致报复。高启征召不仕，朱元璋本来很是窝火，但暂未发作，后来苏州知府魏观扩建府衙，获谴。帝见高启为魏所作《上梁文》，因此暗火变明火，旧账新帐一起算，高启被腰斩于南京。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魏观原本也是含冤而死，高启更何罪之有？

由此可见，做隐士也有难处，如果征召不仕，就可能招致统治者的报复。作为隐士，你就应该及早谋划，隐姓埋名，亡命天涯，才可远害避祸。后汉梁鸿就是这样。王莽所建“新朝”时期的许多隐士，都是“裂冠毁冕，相携持而去之者，盖不可胜数。”（《后汉书·隐逸传序》）

历代，尤其是近现代，人们对隐士多持保留态度，批评多，理解少，褒扬更少，要求太多，对隐士似乎过于苛刻，缺少宽容；本书对隐士肯定多，理解多，批判较少，应该说，更符合历史真实。我们不能用现代标准去衡量古人，更不能用现代的最高标准去衡量古人。

隐士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，也是一种文化现象。现代社会已不具备孕育产生古代隐士的气候、土壤和人文条件。山，还是那座山，水，还是那些水，但时代已经沧海变桑田，古今不能类比。

据报载：今日之终南山，仍有数百名“现代版”的隐士，隐居林泉之下。我认为，他们既不是“箕山之志”的坚守者，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”；他们也不是“终南捷径”的企望者，因为“终南捷径”已不复存在。即使你学富五车，满腹经纶，也不会出现“蒲轮安车”、“冠盖相望”的景象。他们是一批高洁之士，既不谋官，又不图名，悄然无声，不求闻达，只是想逸出现代社会滚滚红尘的浊流之外，寻一块清净之地，或著书立说、或因宗教的虔诚、或休养身心，总之，是为了完成自己

中国隐士的品格\

的宿愿。他们理应受到理解、尊重和关怀。

我们并不赞赏封建时代的隐士以及他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社会观，但应以科学的理念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去研究它、认识它。无论古代隐士或“现代隐士”，我们都应有一颗平常的心，把他们当做平常的人看待，一切疑虑困惑都可释然。中国是一个礼仪上邦，泱泱大国，应该有包容万象海纳百川的气派，倡导百家争鸣，百花齐放。以人为本，以人的诉求为本，应该尊重人权，顺应人性。人各有志，不可相强。在不违背法律，不危害社会的情况下，去发展自己的个性、爱好、才能和特长，完善自己健康的人生观、社会观、价值观，乐观勤勉地去生活。

我们不赞赏隐士，不学习隐士。但要宽容隐士，理解隐士，尊重隐士。

三

《韩诗外传》说：“朝廷之人为禄，故入而不出；山林之士为名，故往而不返。”

在封建社会，智识阶层，历来就由于种种原因，概括起来，无非是出路问题、生活问题，分化为两大营垒。

一是经济仕途派（多数派）。他们要走“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扬”、“学而优则仕”的道路。他们皓首穷经，一年一年地攀登，经过一级一级地筛选，成为“从九品”到“正一品”的十八级官员中的一员，这是金字塔的塔尖和塔身。而剩下的大部分人就是塔基，进入“流外”（“从九品”以下）的孔目层次，即“衙前吏”，指分管中央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在基层政权中的公事杂务，一孔一目皆须经由其手，如令史、驿丞、典史、书吏、押司等，这就组成一整套严密的国家统治机器，并使之运转起来。

二是淡泊名利，鄙视富贵，崇尚谦让，践行中庸，寻求隐

逸，不求闻达的一部分士人，最终成为“岩穴之士”、“林泉之士”，我们不妨称之为山林派。这其中主要是科举失利者，还有因种种原因从统治阶级队伍中的退出者、落伍者。科举失利者占这支队伍的一大部分。科举制度确立于隋代，发展于唐代，完善于宋代。唐代科举取士的员额，三年一举，参加考试的约一千多人，“一举”只录取进士二三十人，比例约为百分之二点五。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统治的五十年中，共取进士一千多人，其比例也大致如此；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，共十三举，录取进士4570人，每举约为351名。参加考试7000多人，录取比例约为百分之五，略高于唐代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举子都名落孙山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都是隐士的候补人选。考中进士的未必就是优秀人才，落榜的人也未必就是不优秀的人才。科举制度本身就天然地存在许多弊病，考试内容和实用完全脱节。科举制度既选拔了不少人才，也埋没了不少人才。

以上两派——仕途派、山林派，实际上一一直在不断地互相诱惑，互相召唤，所以历史上就出现两种其义截然相反的“招隐士”宣传广告。

《楚辞》中淮南小山的《招隐士》，王夫之在《楚辞通释》中推断该篇“义尽于招隐，为淮南王招致山谷潜伏之士”。篇中的一切描绘，都是危险环境的象征，而不是山中一般景物的叙写，特别是作者善于捕捉深山里某些孤独而恐怖的特征，如：桂树丛生、枝条纠缠、云雾弥漫、岩石巍峨、溪水奔涌、猿猴悲啼、虎豹吼叫，写得惊心动魄，历历如在目前。再加上浓厚的主观色彩渲染，表现出一种幽怨抑郁的情思和波谲云诡的艺术魅力，召唤隐士走出山林。“王孙归来兮！山中兮不可以久留。”这是淮南小山招山林隐逸之士出山之作。也可以理解为官方的“招安榜”、“招贤榜”。

魏晋以来，希企隐逸之风大盛，招隐诗的命意则变为招人

中国隐士的品格\

归隐，与淮南小山《招隐士》之义背道而驰，大有设台打擂之意。

西晋陆机《招隐诗》二首，却在歌颂隐士，歌颂隐居生活。“朝采南涧藻，夕息西山足”、“富贵苟难图，税驾从所欲”。大意是说如果仕途坎坷，富贵难图，不如栖遁山林。这里所说的“富贵”，即如《论语·述而》所说：“子曰：饭蔬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，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

左思的《招隐二首》，叙写入山寻访隐士，羡慕隐士的生活，并决定和他同隐。经营山居，享受到隐居的乐趣，说明放弃仕进，摆脱牵累，追求逍遥的隐栖生活，不过是顺从自己的爱好而已。“杖策招隐士，荒途横古今”、“结绶生缠牵，弹冠去埃尘”、“相与观所尚，逍遥撰良辰”，这应理解为山林派或隐逸派的宣言书。

实际上两派都在摇旗呐喊，擂鼓助威。

历代的朝廷方面，多有“访求隐逸”举措，以笼络利用各方面的名流和上层人物，以利于安邦治国。至元十三年（1276），元世祖曾“诏求山林隐逸名士，所在官司，具以奏闻”。号召各级政府广为搜求，及时报告中央。至元二十一年（1284），又“置集贤馆招致山泽道德之士”（《元史·选举志》）。一经发现，便重礼相待，要么委以重任，要么置于集贤馆供养起来，使之起参谋顾问作用。历朝大多如此，用高官厚禄、荣华富贵、封妻荫子、安车侍从等优厚条件为诱饵，广求山野遗贤，征召岩穴之士，请他们走出山林，登上庙堂，为朝廷所用。

隐逸派方面，也在用阴冈白雪、阳林丹葩、丘中鸣琴、石泉清音、餐菊佩兰的山野逸趣，动员和引诱入仕之人，离队倒戈，遁入山林。你们不要“因嫌纱帽小，致使锁枷扛；昨怜破

袂寒，今嫌紫蟒长”。（《红楼梦》第一回甄士隐解读《好了歌》）等于在说，来吧！我们这里有蓝天白云，明月清风：“对榻青山，绕门绿水”；空气清新，景色宜人。“一杯酒，胜如关内侯”，加入我们的队伍吧！

由此，人们经过深思，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隐士能够稀释和冲淡世人对官场、官本位的狂热追求，起到一种清醒剂的作用；它可以使庙堂与江湖，在朝与在野，保持一种平衡作用，对社会风气起到一种净化作用和缓冲作用；它是封建社会一支重要的储备力量，可以在特定的时期，作出某种特殊贡献。这就是为国家储备人才的作用。

试想：如果士人都去走那个千军万马竞争的独木桥，社会会是什么状态呢？这不难想象。由上述情况说来，隐士的作用，不能全盘否定。这个队伍中的有用之才实在太多，只能因势利导，为国所用。对愿守所志者，应该也能理解和宽容。

四

自上古至晚清，隐士成千上万，品秩杂乱，良莠不齐。本书在编撰过程中自始至终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精选慎取。以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、节操等几个方面作为评价标准，以求激扬人们的浩然正气，并鄙弃那些沮丧、颓废、无为的垂暮之风。

具体来说，就是遵循“三不”和“三必须”的原则。

“三不”是：

（一）不采取有闻必录的方法，而必须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，以史为据。

（二）不追求以多取胜，以多求全，以多求杂，而专注于精选慎取。

（三）不囿于某史的《隐逸传》，而精取于众籍，并拾遗补阙。